

◎ 领袖人生纪实丛书 ◎

邓小平

人生纪实

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 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中

邓小平 人生纪实

中

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 编
◎ 领袖人生纪实丛书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目 录

中 册

交 往

“咱们一块干”——与杨得志	504
“不握手会议”——与陈锡联	511
“我就是要用‘王牌’对‘王牌’”——与杨勇	515
“我送你四个字，叫内方外圆”——与秦基伟	527
憾事——与高树勋	530

珍 闻

挺进大别山的决策	534
巧渡黄河	540
鏖战羊山集	543
强渡汝河	550
挥泪斩“马谡”	559
缝棉衣	565
“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567
正逢枫红果香时	571
康泽战败被俘时	574

建国前夕在南京·····	576
--------------	-----

第五编 建国初期 (1949 - 1956)

历 程

挺进大西南·····	587
和平解放西藏·····	596
开创西南财经工作的新局面·····	603
修建成渝铁路·····	612
在财政部工作的一年·····	618
反对高饶的斗争·····	622
1956 年的两次访苏 ·····	629
中共八大·····	636

交 往

好搭档，好邻居——与贺龙·····	642
这样的人应该保护——与阿沛·阿旺晋美·····	647
虚心求教——与费孝通·····	654

珍 闻

批评“五里腿” ·····	657
不准压制民主·····	659
“要让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	661
关心《新华日报》 ·····	663
视察潜艇部队·····	668

“我们来看看同志们”	670
“要像钟表一样准确”	672
“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	674

第六编 十年总书记 (1956 - 1966)

历 程

首次视察大西北	677
石油工业的战略东移	687
视察东北	690
“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	699
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709
下基层调查研究	712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	725
七千人大会	731
亲赴西南大三线	736
总书记的最后一次视察	751

交 往

“人不见面心见面”——与朱德	763
“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与罗瑞卿	770
凡事要乐观些——与吴晗	776

珍 闻

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风波	779
------------------	-----

整顿铁路，抓整章建制·····	783
心系油田·····	786
对人民公社的历史思考·····	791
“猫论”的由来·····	798
一件题词的遭遇·····	802
没有留影的视察·····	805

第七编 十年危难 (1966—1976)

历 程

“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	811
在新建县的日子里·····	815
阐述“三个世界”理论·····	822
四届人大·····	827
旧地重游·····	836
山西大寨之行·····	847
1975年的整顿·····	853
“天安门事件”·····	864

交 往

公正评价，告慰忠魂——与刘少奇·····	875
肝胆相照，共解国难——与叶剑英·····	884
“尊重邓主席的命令”——与王震·····	890
“我愿拜邓小平为师”——与陶铸·····	894
唯一没有鼓掌的人——与萧劲光·····	896
我们完成了任务——与张廷发·····	901

“公明党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与竹入义胜 905

“天塌下来有你们大个子顶着”——与科尔 914

珍 闻

从鹰潭北上 920

治理漓江 924

参观毛泽东旧居 926

患难见真情 929

第八编 拨乱反正 (1976—1982)

历 程

与“两个凡是”的斗争 935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941

大转折关头 948

恢复高考 977

平反冤假错案 982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989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997

“咱们一块干”

——与杨得志

战争年代，杨得志曾是邓小平麾下的一员爱将，抗日战争结束，邓小平回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又将杨得志要回。80年代的华北大演习，邓小平命杨得志负责筹划指挥，杨得志不负所望，演出了国威，演出了军威。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地区统归刘邓指挥。同时决定在延安学习的高级将领奔赴各个战场。

一年前率部来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向邓小平询问关于自己下步工作安排的打算。对于杨得志一直十分欣赏的邓小平说：

“你呀，我的意见，还回冀鲁豫去，咱们一块干！”

杨得志当然十分愿意，接着，即和邓小平同乘一架飞机飞回太行，然后再转赴冀鲁豫军区。

一到军区所在地，杨得志就问苏振华：

“刘邓首长那里有什么指示吗？”

“有几份电报。”苏政委回答。

“快让他们拿来。”杨得志说，“同时，马上给刘邓发报，报告我已经回到了部队。”

联系当前国民党军正在大举派兵北上抢占解放区以及阎锡山派兵进攻我上党根据地的形势，杨得志更感到了刘邓首长对自己的信任和殷殷期望。

9月10日，太行、太岳、冀鲁三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及地方兵团一部，在刘邓首长直接指挥下发起上党战役。

侵占上党地区仅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的真正目的，是控制同蒲、平津两条铁路，以便抢占平津以及整个华北，进而运兵东北，夺取东北，篡夺全国的抗战胜利果实。这样，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平汉铁路，必将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和敌我争夺的焦点。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洞若观火，很快识破了蒋介石的

阴谋，在决定消灭侵犯上党之敌的同时，命令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集中于平汉线，结合太岳、冀鲁军区部队各一部，加紧肃清平汉线新乡以北的日伪军，开辟战场，配合上党地区的作战。

杨得志坚决执行刘邓首长的指示，率部开展了肃清日伪军的战斗，有力地配合了上党战役。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和平协定。《双十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我党我军同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然而，国民党不但丝毫没有执行《协定》的诚意，反而更加速了对解放区的进攻。

蒋介石在《协定》墨迹未干之时，就以14个军分三路沿平汉、同蒲、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解放区突然进击，气势汹汹，大有一口吞掉我华北解放区之势。

国民党第四十军、三十军、新八军、三十二军，并配合伪军孙殿英部为第一梯队，约4.5万余人；二十七军、三十八军、八十五军、七十八军为第二梯队，约5.5万余人，总计兵力约10万人，沿平汉路向石家庄、北平挺进。以十六军、第一军、第三军为左侧卫，沿同蒲路、正太路，经榆次、石家庄北进；以十二军、九十七军和伪军吴化文部为右侧卫，沿津浦路经徐州北进。

一时间，华北平原上铺天盖地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土路上，人叫马嘶，尘土飞扬；铁路上，汽笛长鸣，一列列军车满载着国民党兵和各种军用物资，向我华北解放区杀奔而来。他们企图控制铁路，发挥美国现代化装备的优势，割裂我各解放区的联系，压迫我军退入农村或山地，以便于各个歼灭。

这三路进犯军，以平汉路的为主。其首要的目标，是夺取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邯郸。

平汉路的进犯军善于阵地战，特别长于工事构筑和固守，射击也较准确，但缺乏机动和反攻击精神，尤其不善于运动战。在野战中，惯于以正面部队巩固阵地、钳制对方，以有力部队施行一翼或两翼包围，或以优势火力给对方以有力的杀伤。装备虽较先进但比较笨重，行动迟缓，互相间的协同和支援也较差，对后方顾虑多，怕我军抄他的后路。由于官兵打仗目的不明确，所以多怕死，不善于白刃格斗，最怕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打遭遇战和夜间战斗。

但这些进犯军都是原西北军的底子，军官较有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统驭力强；士兵久经训练，在国民党军队中算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在装备上火力重于突击，其三十军是半机械化部队。

此时，刘伯承、邓小平正在山西上党地区指挥上党战役，尚未返回邯郸。得到敌人杀奔华北的情报，都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因为此时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大多仍在山西上党地区，邯郸前线只有杨得志、苏振华所部不到两万人的兵力。敌我兵力是五比一。

邓小平拿起一支在上党战役中缴获的“三五”牌香烟，划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烟雾，接着又深深地吸了一口，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刘伯承双手捧着茶杯，不住地、小口地抿着茶，也在思谋着破敌之策。

邓小平的烟灰缸里已经扔满了烟头，室内烟雾缭绕，警卫员在不断地为刘伯承续着茶水。

“杨得志他们的担子不轻啊！”邓小平先打破了沉默。

刘伯承显然想出了些眉目，用征询的口气对邓小平说：

“根据敌我态势和地形条件，我们可以把战场选择在平汉线东侧潞阳河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里。这里是多沙地带，不好挖工事，无坚可守，北有潞阳河可挡住敌人进路，南有漳河可阻断其退路，可以把敌人的长处转化为短处，使我军能够避其长击其短。我军东西有纵深的根据地和广大人民的支援，可以叫杨得志他们利用潞阳河、漳河间的横幅地带向敌人实施钳形攻击。这样，或许能顶住。”

一向沉稳的邓政委听后，不禁一拍大腿，高声说：

“好，咱们想到一块去了，就叫杨得志他们这样干。”

为了使作战部队便于统一指挥，经中央军委同意，刘邓首长命令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部队主力，依次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四纵队，一纵队以杨得志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二纵队以陈再道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三纵队以陈锡联为司令员，彭涛为政治委员；四纵队以陈赓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除四纵使用于同蒲路方向作战外，其余均集中使用于平汉路方向。

平汉路的敌情也牵动着党中央。

这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给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诸同志发来电报指出：

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晋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

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晋冀鲁豫两区力量，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八万顽军中，有几个军具有颇强的战斗力，不可轻视。但顽军新到，地理、民情不熟，系统不一，补充困难，急于求胜，又有轻视我军的心理，使我有隙可乘。务望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不失时机，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和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立刻签署了中央局和军区的指示，对各级党委、各军区和各纵队提出了具体要求。

很快，杨苏首长收到了刘邓首长签发的《关于平汉路作战部署给一、二纵队首长的指示》。《指示》明确要求一纵要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顶住北犯之敌。

这时，投入平汉战役的其他部队，因刚刚结束上党之战，尚在开进途中，大战之后全靠两条腿由山西赶来，确实是需要时日的，这就形成了我一个武器装备不全的纵队，要暂时抗击总兵力超过我5倍的敌人的进犯。

杨得志率部进行了10数天的血战，终于完成刘邓首长交给的任务。

1981年3月10日上午，一辆黑色轿车驶入一座大院。这是军委主席邓小平的住处。

车上下来的的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谈话预定内容：总长向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汇报北京军区组织演习的方案与军委办公会议意见。

3月6日，张震代表总参几位领导同志，就组织实兵演习的总体设想和具体方案，给邓小平写了请示信。信中按三个方案分别汇报了拟调动军兵种部队的具体数字和总数，提出按照小平同志指示过的，拟编成集团军进行合练。同时列举了我军另几次较大规模的演习。信中特别指出：

“这是我军历史上实兵演习规模最大的一次。”

邓小平处回话，请杨总长、张副总长于3月10日上午到小平同志处面议。此时的杨得志只有两点想法：第一，见到邓主席，要作进一步的汇报；第二，坚决按邓主席的批示办。

杨得志首先说：

“我们简要地把演习的方案向您汇报一下。”

张震送上演习的方案图。

邓小平接过图，看了一下，说：

“这个图我看过了。”

这显然是说，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既然如此，杨得志便大幅度压缩汇报内容，只用几分钟时间，就预想的三个方案作了简要说明。

杨得志汇报说：

“演习拟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按北京军区汇报的×万人的方案；第二方案，压缩到×万人左右；第三方案，只搞图上作业。这三个方案考虑的根据，主要是调整时期要动用这么多的部队，花这么多的钱，比较困难。在来之前，军委办公会议也研究了一下。有的同志说，按第一方案演习花钱太多，所得的效果又如何？还有的同志说，只动用××军加上一点训练保障，部队不作大的调动，可以节约一些。办公会议其他同志也认为规模小一点好，节约一点好。”

邓小平吸了口烟，并不插话，示意杨得志继续说下去。

杨得志接着说：

“今天上午我又同秦基伟同志电话商量过，他还认为按第一方案好。我们考虑第一方案主要是花钱多些。”

邓小平点点头，说：

“我曾经听到他讲过演习的设想，没有讲要花多少钱。”

杨得志身体前倾，说：

“到底怎么确定好，请邓主席指示。”

张震对第一方案做了一些简要的补充说明。然后两人静静地望着军委主席，请他定夺。

邓小平仍是战争年代的风格，讲话直切正题：

“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我们同越南打了一仗，还不是合成军。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下该有吧！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搞一次。军委常委同志不是都同意吗？”

“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对

部队作风培养都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现在人民不知道军队在干什么，经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给人民看，这样更加强了军民关系，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

杨得志默记着谈话要点——阅兵，观瞻，军民关系。

张震接着邓小平的话题汇报说：

“去年××军搞了一次阅兵，空降兵走得最好，大家反映很好。”

邓小平显然了解情况：

“那次演习听说搞得不错，那次演习规模不大。”

“那次演习是一个师，也用了空军。演习的钱花了××万元，动用储备物资××万元，主要是油、弹药费钱。”张震详细汇报着。

邓小平说：

“就是用油多一些，现在我们油还不多，打的炮弹也多一些。”

说到这里，邓小平一边吸烟，一边扬了一下手掌，拍板道：

“就按第一方案搞一次，节约一点儿，总参具体抓。”

“杨总长是领导小组组长，具体的请秦基伟同志搞。”张震说。

邓小平呷了一口茶，说：

“看看部队这次搞得怎么样，这样的规模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问题看这次的组织能力怎么样。”

张震蛮有把握：

“北京军区集训干部已搞过四次图上作业，已经有一定基础。”

邓小平指示：

“演习时各军区首长、各军兵种首长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总参要抓。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儿，要把部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用炮弹可以，就是油多用了一些，现在主要是生产不出来。”

说到这里，邓小平讲了个用炮弹多的战例，讲着讲着自己先笑了，邓小平难得这么开心。杨得志、张震也会心地微笑起来。

张震请示：

“如果这样搞，要用一笔经费，要动用储备物资。”

最后，邓小平说：

“好吧！就这样。”

张震3月6日的请示信已平展在案头，邓小平提笔批示：

同意这一方案，力求节约。

邓小平

三月十日

3月12日。三座门第一会议室。总长杨得志、国防部长耿飚、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各军兵种负责同志到会。张震传达邓小平的批示和关于演习问题的指示，杨得志讲话，表明对邓小平批示的态度，并宣布演习代号。

3月18日，北京军区召开工作会议，杨得志总长和杨勇副总长到会并讲话。杨得志在讲话中鼓励大家认真贯彻邓主席指示，创造一流成绩，用实际行动改善“观瞻”。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种领导同志热烈发言，说邓主席给了军队最大信任，最大支持，军队要创造出最好成绩，向邓主席汇报。

于是，便有了1981年金秋那举世瞩目的数十万人的华北大演习。

“不握手会议”

——与陈锡联

在刘邓部队一说起“不握手会议”，人们都会对邓小平的严格治军肃然起敬，而这次“不握手会议”的主角，则是陈锡联。大胜之下，部队生出骄气，邓小平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在开会时不但不和高级将领们握手，而且还逼着陈锡联等人作检讨。此次会议，使陈锡联受益终生。

自从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后，几个月来，我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所向披靡，连战皆捷，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战果一个比一个大。正因为这样，在部队中开始滋长起一种骄傲情绪，有的指战员也开始不检点起来，个别部队的斗志有些松懈，群众纪律不大好，军民、官兵团结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数十年来，在军事斗争中，邓小平不仅以指挥有方、多谋善断而闻名全军，而且在治军上是以严著称，在政治上要求绝对服从中央和军委的领导，要求部队无条件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遵守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他重身教，律己严，执行纪律一丝不苟，常亲自深入部队督促检查，一经发现不良倾向，立即进行整顿，对部队的高级干部要求更加严格，从来是铁面无私。现在部队因胜利而带来的一些毛病，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于是，他利用战斗空隙，召开了一次增强斗志、整顿纪律的会议。

被传为治军佳话的“不握手会议”，就是在这一情况下召开的。9月接到开会通知那天，正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和七纵队司令员杨勇，几乎同时收到了通知，要纵队司令员到野司“去开会”，“野司”就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的简称。陈锡联司令员想：一出陇海，活捉赵锡田，仗打得很辛苦，战果也不小，开会又逢中秋节，到“野司”吃月饼去。

陈锡联一到“野司”开会的地方，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气氛十分严肃。

纵队司令员们进屋后刚刚坐下，邓政委就宣布了开会的宗旨：

“今天，开个‘不握手会议’，不要刚打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心满意足，你好我好，什么都好。要更多地想想自己的不足，几个月来做得怎么样？群

众纪律怎么样？内外部的团结搞得好不好？部队的指挥、战斗作风都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现在发言吧！”

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依次发言，指出部队中大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会议从上午开到中午，午饭后接着开，开到下午一两点，这时，不断有参谋人员进来报告：敌人五军和十一师已经逼近了。但邓小平紧绷着脸，就是不散会。趁着会间休息，陈锡联找到了杨勇。

“人贵有自知之明。”陈锡联对杨勇说，“今天咱俩不作自我批评，恐怕就散不了会！”

“是啊！”杨勇同志也十分敏感。

陈杨都知道，六纵王近山司令员也到了会，他大小杨湖作战打得挺出色，是这次会上受表扬的。杨勇自然非常明白陈锡联的意思，他对陈锡联说：

“回去我先检讨。”

陈杨一回到开会的地方，杨勇头一个发言，说：

“七纵军民、军政关系不好，仗也打得不好，所有这些，我全都负责，我回去好好进行整顿，提高斗志。”

陈锡联接着杨勇的话，在会上检查道：

“三纵所发生一切问题，全都由我来负责。”

听到这里，邓政委站起来宣布：

“会议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事后，陈锡联每每回忆起这次“不握手会议”的情形，常爱对人们讲：

“邓政委对高级干部要求更加严格，尤其在重大是非原则问题上，他是决不迁就的；但他对这些干部也非常信赖，相信人们的觉悟，知道高级干部们一旦认识到错在哪里，就一定会勇于克服的。”

邓政委在会议上几乎没有多说一句话，没有多说一个字，但他的话字字重千钧，在陈锡联及其他同志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会后，三、六、七纵首长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立即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有效的整顿。

1947年8月，我军进入大别山后，蒋介石急忙调来20多万重兵进行“围剿”。12月，刘邓首长决定分兵对敌。在研究作战部署时，邓小平考虑到大别山区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同时考虑到刘司令员年纪大一些，提出让他带一纵及中原局机关去淮河

以西。刘司令员不同意。邓小平说：我是书记，是政委，这个事就这么定了。这样，邓小平带着二纵、六纵和三纵留在内线作战。为了拖住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邓小平带领大别山我军民发扬英勇顽强的光荣传统，在数日不得一饱、半月不见油盐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次，陈锡联到前方指挥所，见到邓小平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李副司令员问他：

“锡联同志，背得动吗（指背着敌人行动）？”

还没等陈锡联回话，邓小平就说：

“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我们多背些敌人，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拖住敌人几十个旅，就能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这是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

听着邓政委一番话，陈锡联深为其全局观念所感动，大声表态：

“请政委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多背敌人的任务。”

1949年7月华东解放后，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刘邓大军，在贺龙司令员所率的第十八军协同下，进军大西南。我军采取战略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猛打猛追，所向披靡，很快于1949年11月30日打下了国民党的陪都重庆。一天，刘邓首长找陈锡联谈话，让他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锡联说：

“我不会也不懂地方工作，还是让别的同志干吧！”

邓小平鼓励他说：

“打仗是为人民，当市长也是为人民，不会可以学嘛。”

重庆解放以后，陈锡联就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紧张地投入了地方工作。当时，西南局、西南军区，还有重庆市军管会、市政府等党政军机关都住在市区，大家忙着找好房子住。邓小平知道后，很快就把机关的领导同志召集到他家里开会，非常严肃地说：

“听说你们来了以后房子不够住。大家来西南是为人民办事的，不是来享受的，人民期望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我们刚来，还没做多少事，就闹房子。你们想一想，原来住这些房子的人都到哪里去了！”

听着这发人深省的话语，再看看刘邓首长两家合住一幢房子，人口多，住得很挤，大家觉得既受了批评，也受了教育，什么话也不说了。回去立即动手，让的让，退的退，搬的搬，一夜之间就把问题解决了。

陈锡联对邓小平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在邓小平逝世后，他曾深情地回忆说：